

《战国策》引《诗》研究

周 洁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乱世之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游士阶层,用自己的智慧和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王侯之间,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主动推进着历史的发展。而一直以来被寄寓温柔敦厚诗教的《诗经》在《战国策》之中却没有像以往一样大量出现在文本之中。《战国策》中的人物很少像春秋时期那样赋诗言志,但这并不是说《战国策》不引用诗歌,只是引用相对较少而已。今人虽然对于此部分的研究有所涉及,但很少从整体上研究《战国策》的引诗问题,且大部分的研究都点到为止,过于简单。鉴于此,文章以《战国策》之中的引诗为研究对象,细致分析每段引诗,结合战国时期思想史部分的研究阐释《战国策》中引诗的一些基本概况、《战国策》引《诗》所代表的《诗》学意义并分析《战国策》中出现如此引《诗》情况的原因。

关键词:战国;《战国策》;引《诗》;《诗》学意义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7.09.047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7)09-0047-07

一、引《诗》类型的界定

本文所提及到的引《诗》是指先秦时期诸子和历史文献行文引用《诗经》的现象。先秦作品和诸子著作中所引用的诗绝大部分都可以见于《诗经》,只有少量的逸《诗》不在其中,先秦典籍和诸子百家出自于各种目的的引《诗》在当时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在我们具体分析《战国策》引《诗》现象之前,有必要对于引《诗》的类型进行一下梳理。

(一) 言语引《诗》

言语引《诗》指的是人们在谈话过程中对《诗经》的运用,把《诗》作为谈话内容的论据,增强说话内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证明自己观点和看法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引《诗》很盛行。其中《左传》《国语》就大量记载了言语引《诗》的内容。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称“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1]清代劳孝舆在《春秋诗话》曾经论及春秋时引诗盛况:“自朝会聘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合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其旨焉。”

春秋战国时期的言语引《诗》早已是诗、乐、舞分离的产物,人们引《诗》时已经不关注诗是否合乐,是否符合礼仪的要求。在他们的心中《诗》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诗句的意义以及所引之诗是否可以恰当地作为论说的依据。本文所讨论的《战国策》引《诗》其实就是属于言语引诗。

(二) 著述引《诗》

诸子引《诗》多在战国,其反映的基本风貌比起春秋人物引诗有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大转变的结果。一方面礼崩乐坏,《诗》《书》的权威随之而分崩离析,人们对它们的敬意日渐淡薄;另一方面诸子崛起,新说纷呈。所谓著述引《诗》,即引诗者在著书立说时根据需要引《诗》为用,以增强所述所论之说服力,此时的《诗》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引《诗》者更多的是考虑诗句的意义以及所引之《诗》是否可以恰当

* 收稿日期:2017-05-10

作者简介:周洁(1992—),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地作为论说的依据。战国时期诸子著中,除了儒家各代表人物大量引《诗》,墨家、法家、杂家著述引《诗》也随处可见。

二、《战国策》引《诗》的特点分析

战国时期纵横家在为君王出谋划策和游说时虽然语言辩丽恣肆,但是却很少引《诗》为证,《战国策》所记载的引《诗》较少。经过作者的细致统计,《战国策》引《诗》一共有10处,其中征引逸《诗》竟达5处。《战国策》引《诗》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趋向,即是为自己的观点、利益来成功游说对方服务。在对《战国策》引《诗》的内容进行了初步分析以后,能使我们得以窥探到一点战国时期《诗》学的特点。下面即对战国策引《诗》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 引《诗》数量稀少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战国策》煌煌巨著,其中所引《诗》的部分仅有10处。这和《左传》里大量引《诗》显然不同。据统计,《左传》言语引《诗》一共219处^[1],《国语》提到的赋《诗》和引《诗》合计共25首27次^[2]。通过数量上极为显著的对比,我们发现《战国策》引《诗》数量极为稀少。《战国策》引《诗》数量的稀少与战国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战国时期的文化环境较之著述《左传》的春秋时期已是大为不同了。柳诒徵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中曾经提及这个差异:“春秋之风气,渊源于西周,虽经多年之变乱,而其踪迹犹未尽泯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春秋左氏传》所载,当时士大夫,战国之兴衰以礼,决军之胜败以礼,定人之吉凶以礼,聘问则欲求其礼,会朝则宿戒其礼,卿士、大夫以此相教授,其不能者,则以为病而讲学焉。此等风气,至战国则绝无所见。故知春秋诸人,实以近于西周,渊源有自。故所持之见解,所发之议论,均以礼为重要之事也。”^[3]《左传》《国语》主要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战国策》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历史。在“尊王攘夷”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之风兴盛,《诗》成为外交的工具之一。这反映了在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战国时代,引《诗》并不能够起到良好的外交效果,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论道:“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截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4]而在众暴寡、强凌弱、大并小的战国社会,想通过引用“立于礼”的《诗》而达到政治、外交目的,无疑是很难奏效的。故《战国策》引《诗》较少,亦属正常。

(二) 引《诗》者断章取义且诗义自我明确

《战国策》所引用的《诗》全为断章和断句,而且引诗者大多都是断章取义,其引诗义有时会由引诗者来明确,比如温人引《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后,自己表明引诗的用意为“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再如黄歇劝谏秦王,引逸《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随后说:“此言末路之难。”这说明引《诗》者对于所引之诗句的意思把握得是非常清晰的,也明白所引之《诗》在具体语境中能产生的效果,并为听者阐明其意思。

例如,卷一《东周策》:“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5]

此事又见于《韩非子·说林上》。这个故事讲述的是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小雅·北山》中的诗句:普天之下,没有哪块土地不是周天子的;四海之内,没有哪个人不是周天子的臣民。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子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引《诗》一方面说明了温人面临危急时刻的狡猾和能言善辩,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诗》作为引证材料的说服能力,温人竟然能够通过引用此诗就能打动一国之主。文中所引之诗句出自《小雅·北山》,在《毛诗正义》里的主旨是:“《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於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6]931}温人在这里引用为自己辩护,明显和原本的主旨相去甚远,属于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而针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932}《毛诗正义》里则解释为:“此言王之土地广矣,王之臣又众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但我们发现但所引用的具体诗句其引诗义与诗本义还是大致相合的。

(三)引《诗》的目的是为了陈述某种观点,增强说服力

《战国策》引诗的目的主要是陈述某种观点,为了论证观点的正确性,在引诗时通常还要引用历史事实,以增强说服力。春申君作为楚国政要,被下面的奸佞之徒左右,在短时间内做出相反的决定,王者的威严扫地荡尽,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懦弱无能表露无遗。荀子引《诗》评价春申君说:“上天甚神,无自瘵也。”直接预言了春申君的悲惨下场,在话语中说古论今、用历史上被乱臣贼子所害的君主指出了春申君的未来。这样的论辩方式,可谓最能表达人的怨恨、显得非常的有力。再如范唯劝谏秦昭王时,引诗:“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随后又说:“淖齿管齐之权,缩闾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灭食主父,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兑之类已。”用淖齿、李兑掌权后虐待国君的事例进一步证明“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像这样论点与具体论据相结合,自然让秦昭王深感恐惧,最终下决心废黜了宣太后和穰侯等“四贵”。对于《战国策》中的引《诗》者来说,《诗》不是精神价值的资源,而是机巧权变的渊藪。

再如,卷五《秦策三:秦客卿造谓穰侯》:“秦客卿造谓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邻恤,而莫之据也。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机也。君于成之,何不使人谓燕相国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书》云,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诚能亡齐,封君于河南,为万乘,达除于中国,南与陶为邻,世世无患。愿君之专志于攻齐而无他虑也。’”^{[7]171}

虽然原文写的是“《书》云”,但在《战国策》的注释里却认为此处应当是“《诗》”:“鲍本[书]作[诗]。逸诗。补曰:泰誓。[树德务滋,除恶务本]。礼记丕烈案:吴氏云泰誓,非也。东晋古文以为泰誓耳。策文当本作[诗],后人误依古文,改作[书]也。”^{[7]173}而且通过马王堆出土帛书以及《战国策》释文证实,此“书”却如黄丕烈所说,就是“诗”。因此也应当将这列列入《战国策》引《诗》之中。客卿造认为魏冉只有攻下齐国才能使陶邑强大称霸。而对付敌国,一定要寻找盟友,从盟友的自身利益出发,说服他加盟,如此就有了攻克敌国的胜算。客卿造引用逸诗“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这两句强调了消灭齐国必须彻底,这两句逸诗生动强调了必须攻下齐国的必要性,从而说服对方,这和引《诗》所造成的效果不无关系。

卷六《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楚人有黄歇者,游学博闻,襄王以为辩,故使于秦,说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弩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王若负人徒之众,(材)[仗]兵甲之强,壹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后患。《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孤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韩、魏也。臣为大王虑而不取《诗》云:大武远宅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部国敌也。《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兔,遇犬获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臣恐韩、魏之卑辞虑患而实欺大国也……’”^{[7]241}

在先秦战国时代,《诗经》《易经》是当时最有权威性的经典,如果引用这些典籍上的话语,自然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外交家黄歇有三个地方引用经典。第一个地方用《诗经》《易经》的话语揭示了始易终难这样一个在自然界、社会界都通用的公理,意在叫秦王见好就收。第二个地方用《诗经》说明有王道仁义的国家能怀敌附远,意在叫秦国以仁义对待楚国。第三个地方用《诗经》说明秦国要提防韩魏,而不要来对付楚国。

先引《大雅·荡》两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毛诗正义》里,《大雅·荡》的主旨是:“《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6]1356}明显和此处所讲之事不符合,在这里黄歇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此句。而具体在《大雅·荡》里,这一句的本义为:“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无复诚信。无不有其初心,欲庶几慕善道,少能有其终行,今皆化从恶俗,是违天生民立教之意。”^{[6]1356}引诗义与诗本义大致相合。黄歇引用在这里是说明不能善始就不能善终,实际上是在暗示秦昭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难以设想。黄歇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言说明为了能够防止“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始易终难的结局,防止韩魏借隙袭秦和齐国乘机坐大的危险,秦楚应该联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如此才能征服其他五国,雄踞天下。不管后来的历史如何发展,黄歇的外交雄辩毕竟能自圆其说,收到了暂时抑制秦国攻楚步伐的效果。

又引《诗》:“大武远宅不涉。”《战国策》对此句的注释为:“姚本:逸诗。鲍本:逸诗。武,足迹。宅,犹居

也。言地之居远者,虽有不足,不涉之也。正曰:威武之大者,远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7]251}但《逸周书》此处卢文弼校语:“《诗》必是‘《书》’字之误,梁云:‘大武远宅不涉,《国策》鲍、吴两注及《史记正义》所解各不同,与此文不合,似未可牵连也。’^[8]”“古人引书为说,往往有与原文不合的例子,这在余嘉锡的《古书通例·明体例》,以及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卷一·传闻例》等书篇中可以知道。《战国策》《史记》《新序》与今本《逸周书》文不合,可能也是这个现象。”^[9]因此此句很可能不属于引于《诗》,而应当引用自《逸周书》。这句译为:“有远见的将军不深入他国作战”,说明大勇之人不需要深入远地攻战,这是告诫昭王不要劳师以袭远。

再引《小雅·巧言》里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兔,遇犬获之。”在《毛诗正义》里《小雅·巧言》的主旨是:“《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於谗,故作是诗也。”^{[6]882}“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兔,遇犬获之”的本义是“彼他人而有谗按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跃跃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则能获得之”^{[6]882},与黄歇之引诗义有出入。可见黄歇引诗是断章取义,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以狡兔难得,说明秦虽然强大,但也许可能被别人所图,暗示昭王不要信任韩、魏的友好姿态,正好比吴王相信越王一样。黄歇连连引诗,都是为了向秦昭王证明伐楚不但无利,反而有害。

(四)所引之《诗》多为逸诗

《战国策》之中只有10处引《诗》,但是逸诗已经占了5处。说明逸诗引用的频率极大。而其中所引用的逸诗与《诗经》中的规格体例颇有不同,很多逸诗都与谚语类似。例如《秦策三:范雎至秦》中的“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生”,《秦策五:谓秦王》中的“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而《战国策:秦策三》在注释逸诗:“树德莫若滋,除害莫如尽”时曾有这样的注释:“此与范雎称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黄歇称诗云‘大武远宅不涉’,赵武灵王称诗云‘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传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及谓秦王称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同例。‘诗’字皆有伪。‘远宅不涉’者,周书‘大武远宅不薄也’。高诱注逸诗,当亦有误。”这说明当时引《诗》很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诗三百”的界定,《诗》的外延极为广泛,可见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诗》所传之本并没有统一,我们今天把不见于现存《诗经》中的诗称为“逸诗”,其实在当时未必是亡逸之诗。

三、《战国策》引《诗》所表现出的《诗》学意义及其原因

(一)《战国策》引《诗》所表现出的《诗》学意义

第一,战国时期《诗》不受重视。我们通过上面面对《战国策》的研究会发现战国时期在社会上层之中《诗》并不太受到人们的重视。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国策》煌煌巨著,引用的诗句只有10句,而且引《诗》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例如反复引用《诗》的黄歇。与此同时通过《战国策》引诗可以看出,战国时代宴会赋诗已不复存在。其引诗只是简单的辞令引《诗》,把《诗》作为经典话语加以引用。这和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特征有关系。钱穆先生在他的《秦汉史》中曾经这样描述战国时期的政治变更:“及至战国,而其为变益烈,循至造成一绝异之阶段。其先诸侯兼并,次则大夫篡夺。一姓一宗封建世袭之诸侯,渐次沦亡,而军政国家之规模以于形成,在内务开辟,在外则事吞并。”^{[10]4}政治上军政国家的形成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实际的利益和军事上的功业。因此《战国策》即使引用《诗》来说理,往往也会在其后加上历史事实才会具有更理想的劝说效果。在另一种层面上说,正是《诗》本身到战国时期已经渐渐不受重视,不那么容易让人完全信服,《战国策》的引《诗》都表现出《诗》公信力的渐渐缺失。

第二,春秋礼乐文化在战国解体,分析《战国策》的引《诗》情况,可以深切感受到自春秋兴起的赋《诗》传统和引《诗》传统在战国的衰亡。而这反映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对于礼乐文化彻底不同的态度。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贵族文化发展到最高点的时期,钱穆先生曾经在《国史大纲》中这样论述春秋时期的一般文化特征:“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羡慕与敬重。大体而言,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已经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去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

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11]正如钱先生所说的,春秋是一个重礼的时代。同时,春秋也是一个用《诗》的时代,赋《诗》、引《诗》、歌《诗》是礼乐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呈现,称引《诗》不仅仅是知识的展示,独立的《诗》在春秋文化精神中是不完备的,是残缺的,它们必须与礼、乐结合在一起,以礼乐精神为指导、为归依,共同构成春秋礼乐文明体系,因此,当我们欣赏春秋时代赋《诗》、观《诗》活动时,感动我们的不只是贵族卿大夫对《诗》的熟识,还有引《诗》、赋《诗》过程中所蕴含的宏大礼制背景和壮观庄重的典礼仪式以及时人对诗乐所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向往与怀恋。因此可以说,《诗》是春秋精神、春秋气象、春秋风度的代表。因此《左传》之中才有那么多令人称道的引《诗》、赋《诗》事件。通过分析《战国策》的引《诗》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战国时代《诗》地位的下降,以及自春秋时期就兴盛的礼乐文化体系的解体。《诗》的衰落代表着诗乐文化的消解,宗周礼乐文明的大厦彻底崩颓,而赤裸裸的功利的追求与诈伪之术的兴起是促使礼乐文明垮塌的催化剂。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的历史,最长也不过两百五十多年,但这两百五十多年却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转折的关键时代。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中提到过春秋和战国巨大的差异:“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时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者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12]对此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分别孕育出委婉含蓄的春秋辞令和铺张扬厉、诈橘并用的战国策士辞令。战国辞令中的引诗方式都是对《诗》的某个句子的引用,借用诗句的本义或者引申义来证明观点,《诗》在此时完全失去了在春秋时代那种典礼意义。战国辞令引诗更重视的是诗句的本义,并且在辞令中引用的诗句属于众多言辞的一部分,言说者是把诗句当成谚语、熟语等来运用了,根本没有像春秋时代引诗那样考虑到《诗》的委婉隐讳含蓄的特点,春秋时代非常含蓄的诗歌在战国辞令中变得非常直接和具体。《战国策》引诗可看出:纵横家口中的“诗”,与儒家传述的《诗》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在这里,与其将“诗”理解为“先王之典”——《诗》,不如说,它更侧重于“诗”字本义,指那些具有经验意义的格言警句,与“谚”表现了相类似的性质。纵横家之引《诗》,与引用谚语、歌谣一样,仅仅只是一种言语修辞的方式。这一现象说明,随着贵族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开始重新组织自己的秩序,《诗》所指涉的那种精神价值已经被当做愚蠢的象征时,《诗》的功能就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失去了价值内涵,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战国的策士们的“断章取义”是改变诗的原有之意而使之符合自己言说的需要,其着眼点是大不相同的。综上所述,在战国时期,春秋的礼乐文化已经解体了。

(二)《战国策》引《诗》所表现出的《诗》学意义及原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在战国时期首先《诗》不受重视,其次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已经解体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国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战国时期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在当时的确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可以说变革精神贯穿了战国时期的全程,变革的要素渗透到战国时期的各个方面。在军事上,战国姓“战”,战国时期不管是战争的规模、手段还是战争造成的后果,都是春秋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往往十分巨大,《战国策》里面的很多战争动不动就是出兵十万甚至数十万。而春秋时期的战争大多是用以战车为主的“车阵战”,战争双方列出战车镇,拼死而战,战法单调。而到了战国时期往往采用步兵和骑兵的野战技术,战争更加机动灵活,杀伤力也更巨大,再加上铁质兵器的普遍运用,战争的残酷性渐渐显现出来。经济上,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重视商业贸易,把经济大大搞活,为了发展经济一些国家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而且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流通也日渐活跃,而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又进一步带动了产品交换与商品市场交易的发展。经济的变革又是和政治的变革合在一起的,变法成为当时的“时尚”。魏国李悝的变法,赵国公仲连的变法,楚国吴起的变法,韩国申不害的改革,齐国邹忌的改革,秦国商鞅的变法,震动的不仅仅是一国一地,而是整个战国社会。因此,战国时期《诗》不受重视,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已经解体的现象与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社会有关。

第二,东学西渐,文化西迁的影响。战国时期出现不同于春秋时期的《诗》文化现象还与战国时期东学西

渐、文化西迁有关系。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对战国年代进行了历史分期:“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减。最要的是齐、晋两国之君统篡易,维持春秋以来两百数十年封建文化之霸业,遂以中歇。诸夏和平联盟之锁链已断,各国遂争趋于转换成一个新军国,俾可于列国门争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第二期时新军国成立以后相互门争时期,此时期又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是梁惠王称霸时期,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齐、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第二期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亦可说是齐、秦争强时期。此期自齐、魏相王下迄齐灭宋,凡四十八年。第三期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亦可说是赵争强时期。此期自齐灭宋下至赵邯郸围解,凡二十九年。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通过此分期,如果了解战国时期地理的分布可以发现,从最开始齐国称霸到最后秦吞六国之前,整个权力的中心是不断西进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氛围;齐鲁学者大多承袭孔学,大多尚文化,重历史,议论思想也以整个社会为主,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三晋之士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只是谋求国家富强为基准,用意所在只是就现状来助以革新;而秦国地处西陲,文化程度较之东方远逊,秦国的兴盛也不是靠国家文化兴盛的,而是靠变法和一系列兴国措施,因此秦国所重的是功利文化。据钱穆推测秦国文化当时承袭自三晋:“盖三晋之与秦,一则壤地相接,二则三晋学风多尚功利务实际,亦与秦土旧风易与相得,此则所谓文化西渐者,以三晋为大。”^{[10]38}由此可知战国后期,秦国强盛无比,其重功利的思想广泛流传,社会上所耳濡目染的都是为功名利禄左右奔走的风气。战国时期《诗》不受重视,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已经解体的现象与战国时期东学西渐、文化西迁的文化背景有关。

第三,非儒家文化的兴起,百家争鸣。先秦诸子之学,出现于春秋晚期,而大盛于战国。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围绕当时社会的核心议题展开辩论,他们互相争鸣,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史称“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曾经称这种现象为:“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就可以想见当时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了。但在百家之中,儒墨两家最有实力,当时有“非儒即墨”的说法。两者分别代表社会两种不同阶层的立场。墨家的兴起一改春秋时期儒家占据的绝对领导地位。墨子的思想与儒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墨子提倡“兼爱”和“尚贤”,强调消除亲疏、贵贱的分别和主张任人唯贤,强调打破等级观念,这和儒家所崇尚等级制度和用三纲五常来维护统治的学说迥然不同。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也被务实而倡导节俭的墨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而吕思勉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中更加证明了这种说法:“墨子的宗旨,主于兼爱。因为兼爱,所以要非攻,又墨子是取法乎夏的,夏时代较早,又值水灾之后,其生活较之殷周。自然是要俭朴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于贵俭。因为贵俭所以要节用,要节葬,要非乐。”^[13]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到了战国,春秋时所兴盛的礼乐文化逐渐解体。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对早期秦国产生过深远影响。到战国中晚期,随着政治一统趋势的发展,出现了各派思想逐渐融合的趋势,更加消解了春秋时期儒家对于整个政治文化格局的绝对影响。

第四,游士的兴起。士在战国时候人数大增,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之中考证春秋晚期贵族下降为士。他认为“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士的人数不免随之大增。”^[14]于此同时,墨子主张“尚贤”,其实尚贤即是尚士,贤与士在《墨子》里可以互训。《亲士》篇开宗明义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15]

多种因素的综合使战国时期十分盛行私门养客和游士。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春申君黄歇礼贤下士,招引门客,最高峰时黄歇有门客 3000 多人,其数量在“战国四公子”中居于首位。私门养客的大量兴盛使得当时大量的士人抱着做官扬名立万的野心去投奔各种达官显贵。各国国君也喜欢招徕贤士,许以高官厚禄,各国贵人也纷纷以养士为荣。一时间,从上至下都兴盛起了一种游说之风,争利求名已经成了当时的人生哲学。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战国策》中《诗》不受重视以及《诗》主要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而引用的现象。引《诗》不再是张扬或标榜某种精神性的价值或意义,而是直接指向功利的目的。《诗》之所以还被引用,是由于文化惯习使得诗还残存着一点影响力,可以增强言说的效果。那些游说诸侯、追逐富贵的纵横策士们也都是博古通今、

满腹经纶,但这不是为了道德和人生价值上的追求,而是求富贵与飞黄腾达的资本。

注释:

- (1) 关于《左传》言语引《诗》的数量,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董治安在《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中的统计结果是:引诗219条,赋诗68处。张林川、周春健在《〈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中的统计结果是:言《诗》之处凡277条,涉及《诗》152篇,其中可以划归引《诗》范畴的共255条,涉及《诗》132篇。并且将其分类:“《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如下六类:一曰‘赋诗’,二曰‘诵诗’,三曰‘歌诗’,四曰‘言语引诗’,五曰‘作诗’,六曰‘泛称诗’。”夏承焘在《采诗与赋诗》(《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的统计结果是:引诗一百三十四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的共三十一处。

参考文献:

- [1] 朱自清.朱自清说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06.
 [2] 章莉.浅论春秋赋诗传统的终结——《国语》《战国策》涉诗文本的比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2).
 [3]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09.
 [4] 刘向.战国策:战国策叙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
 [5] 刘向.战国策·卷一东周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6.
 [6] 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31.
 [7] 刘向.战国策·卷五秦策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1.
 [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0.
 [9] 王挺斌.《逸周书》训诂札记四则[M].上海: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10] 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
 [11]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8—70.
 [12]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
 [13]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263.
 [1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
 [15]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A Study of Classic of Poetry Cited in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ZHOU 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haotic time in the Warring States time, the sophists came onto the historical stage. They used their wisdom persuasive strategies to lobby princes and the noble when talking and chatting with the them,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positively. The gentle, sincere and honest poetry of *Classic of Poetry* did not appear as much as before in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the character in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rarely expressed their ideal by poems as they di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owever this does not to say that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did not quote poetry, but the reference was relatively small only. Although this research on quotation is involved nowadays, it is limited in the whole, and most of it is too simple and only touched the surfac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the Warring Stat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ited poems in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alyzing each of them to make clear of the basic citation situation, the meaning and the reasons of poetry citation in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Key words: Warring States;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Citation of *Classic of Poetry*; the meaning of *Classic of Poetry*

(实习编辑:王崛兴 责任校对:金玉)